

历史与小说的互文

——基于新历史主义立场的“历史编撰元小说”

汤黎,李跃平

(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历史编撰元小说”这一概念由加拿大著名学者琳达·哈琴提出,意指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文坛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此类小说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情节的语境重构将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并置,既体现又模糊了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界限,凸显了后现代文学的矛盾特质。这一概念的提出,在西方文学评论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马克·柯里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指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重要叙事学功能之一就是突出历史小说的主观性。此概念阐明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没有等级体系的问题;两者都是文化表意体系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历史编撰元小说”;新历史主义;互文;琳达·哈琴;马克·柯里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1-0135-05

“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这一概念由加拿大著名学者琳达·哈琴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1988, 简称《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提出,意指“那些文明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1]6}。哈琴认为,历史编撰元小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美文坛出现的一种“将制作、接受过程及文本的语境改设在整个交流情境之内,这一情境包括上述过程和文本赖以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历史和审美语境”^{[1]56}的后现代主义在小说创作中的实践,体现了历史编撰书写的“后现代转向”。此概念的提出和新历史主义的背景不可分割。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并且认为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将历史和文学并置,既体现又模糊了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界限。“历史编撰元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在西方评论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不少理论家都对此作出回应。其中,后现代叙事理论家马克·柯里(Mark Currie)在其《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指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重要的叙事学功能之一就是突出历史小说的主观性^{[2]38}。“历史编撰元小说”概念的提出,凸显了后现代文学的悖论特性,阐明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历史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没有等级体系的问题,两者都是文化表意体系的组成部分。

一 新历史主义立场下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就成了文学理论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新

收稿日期:2013-07-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理论之后’国内学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和反思——以五种外国文学类期刊为例(2003-2012)”(项目编号:SC13WY11)、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外国语言文学”(项目编号:2013XWD-S05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汤黎(1982—),女,四川内江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李跃平(1958—),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历史与文学都是叙述的文本。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坚持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清晰分界,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是“背景”与“前景”的关系。后结构主义则认为,历史和文学具有同质性:“两者都是话语实践,传统历史学所强调的同一性、发展性的历史甚至是诗学机制在历史叙述领域运作的结果。”^{[3]673}新历史主义者主张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3]673}。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指的是只能依靠历史文献、典籍等来体验历史,然而这些文献却是“经过保存和抹杀的复杂微妙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3]673}。新历史主义拒绝接受“文学”/“历史”、“文本”/“背景”的简单二分法,认为“历史不可能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对照物或者是稳定的背景,而文学文本受保护的独立状态也应让位于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动,以及它们边界的相互渗透”^{[3]673}。

历史和文学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和相互关系随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保罗·维因(Paul Veyne)将历史叫作“一种真实的小说”,暗指历史和文学共享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语境以及形式技巧。换言之,历史文本同文学文本、理论文本一样,都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历史写作不再是对过去客观的及无私的记录,而是一种借助某些(叙述性/解释性)的运作模式,企图理解和支配过去^{[4]61}。新历史主义立场下的文学不再是社会历史的再现和反映,而是参与到文化和历史的建构之中。此外,历史也只是主观选取的、带着价值评判的文本,是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一系列文学性叙事比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是多种异质文本交汇的场所,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美国新历史主义学家维色尔(Harold Veaser)给新历史主义列出的五种共同原则中包括以下两点:每一种揭示真相的、批判性的、反对的行为都使用它所谴责的工具,并冒着成为它所揭露的惯常作法的牺牲品的危险,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相互流通^{[2]98}。历史编撰元小说将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并置,以及其凸显又模糊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之矛盾特性十分符合上述两点。为了揭示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的互动性,“新历史主义者提倡用历史轶事作引子,从传记、日记、野史等材料中抽取文学作品中的细节,通过分析揭示它们和

经典文学文本之间暗藏的联系,绘制精妙的社会文化图景”^{[3]674}。历史编撰元小说通过对上述材料的运用来削弱历史资料来源和阐释的权威性和客观性,从历史和小说的融合来展现了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

历史和小说的叙事都在选材、组织、时态、情节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规则。两者的叙事都力图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非真正客观的还原事实。“历史和小说都是话语、人为构建之物、表意体系,两者都是从这一身份获得其对真相的主要拥有权”^{[1]127}。历史编撰元小说则建立又跨越了历史和小说之间的叙事框架,用“既/又”的后现代思维方式连接了历史和文本。历史编写和元小说的互动否定了所谓的“真实”再现。“它们都同样具有互文性,在其自身复杂的文本性里有效地利用了过去”^{[1]142}。历史编撰元小说将历史同其自我再现问题化,站在新历史主义的立场,采取故事叙述的方式来描写历史题材,将元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历史编撰学结合起来,通过元小说的自我指涉来揭示出历史的虚构性,并以此揭示其背后的权力政治内涵。作为欧美后现代小说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对文学、历史和理论这三个领域的融合使其在“理论层面上自觉意识到了历史与小说都是人类构建之物”^{[1]6}。此概念的明确提出,形象地阐释了历史和小说的同质性关系。

二 琳达·哈琴的“历史编撰元小说”概念

加拿大著名学者琳达·哈琴,是国际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出版有《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反讽之锋芒》(*Irony's Edge*, 1994)、《后现代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2002)、《论戏仿》(*A Theory of Parody*, 1985)、《论改编》(*A Theory of Adaptation*, 2006)、《自恋式叙事》(*Narcissistic Narrative*, 1984)、《歌剧》(*Opera: The Act of Dying*, 2004)、《身体的魅力》(*Bodily Charm: Living Opera*, 2000)等多部学术专著。哈琴的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问题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一书就对于“历史”和“小说”等论题进行了问题化的解读。此书充分意识到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复杂性,指出后现代主义既是现代主义矛盾造成的结果,又是对其的背离与质疑;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和戏仿性,又试图将自己植根在其指涉和戏仿似乎要避免的历史世界之中,从而增加了论辩的深度与效力及可接受性^{[6]封底}。

琳达·哈琴在此书中提出,历史编撰元小说是唯

——一种圆满体现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小说。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和艺术的分离,反对过去把历史和文学割裂的状况。历史编撰元小说将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体现后现代主义悖论的统一体中,是“一种强烈感受到自己的虚构性,却又涉及真实历史事件的小说”^[5]。此种小说运用元小说的技巧来让读者认识到:历史是一种在过去的文件和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叙述,而非对过去的自然再现^{[6]99}。在哈琴看来,历史编撰元小说展示了过去和现在审美和政治之间对话的相同诉求。她认为可以被称之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格拉斯(Grass)的《铁皮鼓》(*The Tin Drum*)、福尔斯(Fowles)的《蛆》(*A Maggot*)、多克托罗(Doctorow)的《鱼鹰湖》(*Loon Lake*)、里德(Reed)的《可怕的两岁》(*The Terrible Twos*)、汤亭亭(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芬德利(Findley)的《著名的遗言》(*Famous Last Words*)、拉什迪(Rushdie)的《耻辱》(*Shame*)等等^{[1]序,1-2}。这些小说通过自我指涉性叙述对历史进行戏仿,质疑了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之间绝对化的区别,在历史重构中呈现出新的审美意识和政治诉求。

然而,尽管历史和小说具有相同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以及技巧形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编撰元小说先确立、后模糊小说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有本质的区别。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对过去的消遣’”一章中借用了匈牙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乔治·卢卡契(Georg Luacs)提出的传统的历史小说的三个标准,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传统历史小说和历史编撰元小说之间的三点显著区别。第一,历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是“综合了一切人类和社会的基本决定因素”^{[1]154}的一个典型;然而,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主要人物则是虚构的历史里被边缘化的外围人物。第二,历史小说中细节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无关紧要。然而,历史编撰元小说却通过游戏式的方式利用了历史记载的真相与谎言。此外,在实际使用历史资料细节方面,历史小说通常并入和同化历史数据以追求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而历史编撰元小说则很少完全吸收历史资料,而是要通过历史资料的使用来凸显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悖论。第三,很多历史小说通过对过去真实人物的描写来证明虚构世界的真实性,并且以此掩盖小说和历史的相连之处。而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自我指涉性,则问题化地

提出了小说和历史这两者之间实质上的关联:“历史编撰元小说强调其表达语境——文本、制作者、接收者、历史和文化语境——这就重新设定了一种(问题重重的)共同工程”^{[1]155}。

将“历史和文学并置”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颠覆性,其倡导的“历史文化转向”背后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诉求,探寻着文学与历史、文化、政治权力的关系。“后现代文化故意自相矛盾,既使用又诋毁话语常规。它知道自己无法摆脱与时代的经济(晚期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自由人文主义)要素的联系。……它所能做的只有从内部进行质疑”,历史、自我个体、语言与其指涉对象的关系、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这些观念都受到了拷问^{[1]序,7}。历史编撰元小说通过历史编写和小说之间的互动来探讨身份与主体性的问题、互文与再现的问题,最终指向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对主体性的探讨方面,历史编撰元小说既确立又颠覆了传统的主体性概念。此类小说在某些层面上对主体性提出公开的质疑,运用多重叙事或故意进行操纵的叙事者等叙事技巧将主体和历史连同叙事本身一起同时被去中心化。在互文性方面,历史编撰元小说使用和故意误用互文性模仿,体现了在新的语境中书写过去的愿望。同时,历史编撰元小说在对历史的“游戏”中也没有轻视历史和事实,而是从元小说的角度重新考虑历史和小说之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关系,从而将其政治化。主体性、互文性、指涉和意识形态造就了后现代主义中历史与小说之间遭受质疑的关系^{[1]163}。

哈琴称历史编撰元小说是“对过去的消遣”,阐明了其对历史的戏仿性。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第八章“互文性、戏仿和历史话语”中集中讨论了此命题,“这种带有浓重反讽意味的戏仿经常赋予了小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性:就以戏仿的形式在文本里重写‘世界’和文学的过去而言,历史和小说的互文本具有相同的地位”^{[1]166}。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互文戏仿表现了一些当代历史编写者的观点:它提供了过去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但只能借助其文学文本或历史文本以及过去的痕迹来了解过去。历史编撰元小说所运用的反讽确实标明了与过去的差异,但是与过去文本的互文呼应同时又从文本上和诠释学的角度肯定了与过去的联系。互文性用读者—文本的关系取代了饱受质疑的作者—文本的关系,把文本意义的位置放在话语自身的历史里,文学作品只是以前话语的组成部分,一切文本都是从这种话语获得意义^{[1]167-169}。

哈琴在其学术著作《后现代主义政治》中谈到,“后现代小说并没有切断与历史和世界的关系,它只是凸显并以此来挑战那种有关(语言再现与世界和历史之间)无缝对接的设想的惯例性和未被招认的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读者去反思我们籍以对自身再现自我和世界的过程,从而认清我们在自己的特定文化中对经验加以理解并建构秩序的那些方式”^{[4]53}。她所提出的“历史编撰元小说”这一概念也正符合她的此种观点。历史编撰元小说将“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小说作为一种理论”^{[6]104}来呈现给读者,其目的是通过多元化的阐释来进行自反性思索。

三 马克·柯里对于“历史编撰元小说”概念的阐发

“历史编撰元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在西方评论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后现代叙事理论家马克·柯里充分重视“历史编撰元小说”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并将其同后现代叙事理论相结合。他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对哈琴所称的“历史编撰元小说”这样评论道:“是一种理论性小说,因为它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关于历史叙事的看法。正如20世纪文学批评首先是拒绝19世纪的历史主义范式,而采用刻板的形式主义方法,继而拒绝形式主义而采纳新历史主义方法而呈循环状态一样,小说实质上也是从历史现实主义模式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形式上的自我意识和实验状态,又进入一种新的反讽式历史状态”^{[2]74}。他认为,此类小说可以说明,历史研究中有叙事的形式而叙事形式中又有历史的成分^{[2]38},而历史编撰元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后现代叙事模式的一个典范。马克·柯里肯定了琳达·哈琴关于“后现代小说的定义是自我反射主题和小说与历史的关系”^{[2]72}这一看法。他认为,元小说的自反性赋予了小说以新的哲学意义,增强了文本的历史责任及指涉性。

对于历史编撰元小说对叙述方式的创新,马克·柯里阐释了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例举的此种小说的一个常见特点,就是将现代主义的开放性结尾试验带入历史的领域,突出其道德功能。他对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所提及的一些历史编撰元小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譬如,萨尔马·拉什迪《午夜的孩子》,“其情节带有历史叙事的主观性,开头和结尾置于中间,以避免做出任何冒失的道德结论”^{[2]77}。《法国中尉的女人》以“似是而非的方式,突出了作者或叙述者如上帝般的权利和阅读者的自由,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结尾的自由”^{[2]77}。

通过这些批评性创作手法,这些小说在表现过去的过程中探讨叙述性的意识形态作用。在互文性方面,像《法国中尉的女人》和《午夜的孩子》这样的小说将历史和小说的互文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通过援引和模仿其他小说及那时期的科学文本实现互文,后者通过对侨居印度的英国人的小说的仿拟及不断引用新的印度媒介作为当代历史的中介者达到互文。这些小说提出,“历史记录总是在文本之中,换言之,历史的表现总是受到表现的传统的限制,这些表现就是在传统中进行,它们描绘了一个文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历史事实、历史呈现、史学意识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2]77}。

后现代主义是双重戏仿和双重编码的,介乎真实和虚构之间、历史和小说之间、文字和形象之间。后现代文学具有“总和性呈现模式”(a mode of totalizing representation)。此种模式指历史、小说甚至理论的作者,都对其写作素材进行加工,使其连贯和统一^{[4]69}。历史编撰元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总和性呈现模式”,是把特定意义赋予过去的创作方式。历史编撰元小说不仅将历史融入了小说,其元小说的特性也将某些明确的陈述式的、传统上属于批评或理论的话语融入小说。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引用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在写《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时所言“我发现了一贯知道(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讲述)的是怎么了;书总要讲到别的书,每个故事所讲的都是已经被讲过的故事”^{[1]172},来说明历史编撰元小说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的双重话语。而马克·柯里则同样借用了这段话,认为它明确地阐述了小说的互文性理论。由此他指出,将批评作为一种互文关系而非元语言的思想将介乎小说与批评之间的理论性小说统一了起来。“互文性提出了一个指涉模式,这个模式分辨不出对外部世界的指涉和对另一文本的指涉。因为文本性是融入一切事物之中,这便是它在美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出发点”^{[2]77}。

新历史主义让历史文本进入了文学分析,让文学研究的领域从经典文学文本的狭义范畴扩大到了文化文本的各个层面。历史编撰元小说表明,历史对小说具有重要影响,而历史又是被话语所建构的。我们今天只能通过过去的文本了解过去,而这正是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所在。历史编撰元小说承认小说撰写、历史编写不可避免的文本性,以其独有的方式质疑历史和

虚构的区分,试图重新定义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的部分立场是,正视虚构/历史再现、具体/一般、现在/过去的矛盾。这一正视行为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它拒绝复原或者消解两个对立面的任何一方,而且更愿意对两者都加以利用”^{[1]143}。自相矛盾的历史编撰元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此种悖论的完美注释:它将自己置于历史话语中,同时也拥有小说的自主性;凸显又模糊了历史和小说的界限。历史编撰元小说显示,“事件”与“事实”有别;此种小说想强调的也正是

事件(本身并无意义)和事实(被赋予了意义)之间的差异。作为最能体现后现代小说特征的小说类型之一,历史编撰元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认识、深刻理解和适应复杂的“事实”,如何才能发现“事实”背后所隐藏的内涵。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对过去的再现无一例外地都有具体的意识形态内涵”^{[9]69},历史编撰元小说利用其能够在社会中发现的一切行之有效的表意实践进行再现,体现其所倡导的“历史文化转向”背后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

参考文献:

- [1]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3]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4]Hutcheon L.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 [5]袁洪庚.后现代主义文学:琳姐·哈琴笔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0,(3).
- [6]Nicol B.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White H.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M].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Based on the Neo-historical Position

TANG Li, LI Yue-ping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raised by famous Canadian theorist Linda Hutcheon, refers to a trend of postmodern experimental creation which appeared in 1960s and 70s in the field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kind of fiction juxtaposes history with fiction through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 and plot, bears the self-refer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metafiction, meanwhile includes lo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thus both embodies and blurs the binary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expresses the paradox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This concept aroused hot reflection in the range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Mark Currie made detailed analysis about this concept, pointing out that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arrative functions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is to reveal the subjectivity of history. This concept illustrates the idea of neo-historicism: there’s no classified system in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both of them are the compositions of cultural representing system.

Key word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neo-historicism; intertextuality; Linda Hutcheon; Mark Currie

[责任编辑:唐 普]